

20<sub>世纪</sub>  
中国学术文存

主编/陈平原

A Collection  
of the Research Papers  
in the 20th Century  
of China

---

晚明文学思潮研究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明文学思潮研究/吴承学、李光摩编.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陈平原主编)

ISBN 7-5351-3286-3

I. 晚… II. ①吴…②李… III. 文艺思潮—文学研究—中国—明代 IV. I20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3253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传真:027-83619605  
邮购电话:027-83669149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版 次:2002年10月第1版  
字 数:446千字

(441021·湖北襄樊盛丰路45号)  
5 插页 18.25 印张  
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7-5351-3286-3/I·117

定价:27.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 说 明

一、为了弘扬学术、传承文化,我们推出了大型丛书《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以下简称为《文存》)。

二、《文存》是一套集多学科、多层次、多卷本而成的20世纪学术研究成果精华库,其每一卷都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导论、文选、目录索引,三者互为呼应。

三、《文存》中的“导论”和“目录索引”部分,均按现行的出版标准和规范进行排印。

四、对《文存》中的“文选”部分,需作如下说明:

1. 选文的时间范围:上限为1901年,下限为2000年;
2. 选文的地域范围:涵盖大陆、台湾和港澳地区的原创之作,对国外的原创之作不作统一要求;
3. 对所有入选的作品,一律采取简体横排;
4. 将原载中带有注码的注释统一改为篇末注,对括号内的夹注也进行了版式统一;

5. 对原载中的直接引文进行了版式统一；

6. 对原载中的标点符号(尤其是书名号、引号等)进行了版式统一；

7. 由于入选文章时间跨度大,地域范围广,语言规范不一致,故对其原载文字不进行整体上的统一,也不一一校勘;这样既可以反映学术史的真实,同时也尊重了原文,保持了原貌,从而给读者以一定的历史感。

8. 出于篇幅的考虑,少数长篇论文或论著进入《文存》时采取了节选的方式,并予以注明;节选部分的章节序号也完全依照原载;

9. 由于一些不可克服的原因,对少数经典论文采取了存目的方式。

五、特此说明,敬请广大读者鉴识。

## 总 序

陈平原

给 20 世纪中国学术做总结，此举曾被毫不犹豫地断为“狂妄”（因当初对此项工作感兴趣者，多非博学鸿儒）；没想到风云变幻，才几年时间，“学术史”竟成了时尚话题。于是，又有高人出面冷嘲热讽——都什么时代了，还在摆弄那些“老古董”。如此一波三折，宏图尚未真正展开，已被中国学界“消费”得差不多了。其实，学术史研究之回首往事，既倍感痛苦，又进展缓慢，吃力不讨好，难怪其“风声大，雨点小”。对于踌躇满志、正忙着“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学界来说，最响亮的口号，依然是“拿来主义”。

日本学者竹内好在《鲁迅》一书中，对鲁迅“不退却，也不追随”的性格，有如下描述：“他让自己与新时代论辩，由于‘挣扎’而清洗自己，再把清洗后的自己从中脱出身来。”这种夹带着血与泪的“挣扎”，不同于世人之动辄“幡然悔悟”，因其有切肤之痛，步子可能迈得更坚实些。如果不避拉大旗做虎皮之讥，我愿意将此思路移用于今日之学术史研究。表面上属于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性选择，而我更看好的，却是其中的自我反省意识。外行只见其指点江山，似乎痛快淋漓；身处其中者，则不无鲁迅“抉心自食”的意味。所谓自省，既针对整个学界，更针对学者本人，这也是我再三说的，对有志于治学术史的人来说，“过程”可能远比“结果”重要。

以“文存”而不是“通史”的方式立说,有便利读者的考虑,但更重要的,还是挑战目前中国学界普遍存在的“好大喜功”、“华而不实”。话越来越多,书越写越厚,可见识却越来越少。与其写一部屡经稀释的百八十万字的“通史”,不如老老实实,讲完自家的点滴体会,引领读者进入某一已相当充盈的“学术角”。这里奉献的每册图书,均包含学术史性质的“导论”、群星闪烁的“文选”,以及相关论著的“索引”三部分。“导论”见史识,“索引”显功夫,“文选”部分则在对先贤表达敬意的同时,为后来者提供阅读及研究的方便。

“导论”的责任,主要不是表彰优秀论文,而是准确勾勒本专题在20世纪中国的兴衰起伏,因而,更像是一部采取特定视角的具体而微的学术史。如此定位,要求研究者不仅有历史感,更应具前瞻性。说到底,论者透视历史的深度,与其展望未来的能力成正比。学术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问题意识”,决定了本丛书的工作目标:既须“史”的深厚,又兼有“论”的新锐。

至于选题的原则,暂时局限在“人文学”,尤其是其中的“中国研究”。所选专题,要求以往的研究成绩显著,思路清晰,而且至今仍能吸引学界的目光。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选题最好是不大不小,不新不旧——太小学术容量有限,太大则无从把握;太旧不能吸引今人目光,太新则没有历史积累。

以“选本”带“综述”的形式,总结20世纪中国学术进程的某一侧面,乃本丛书的基本框架。这么一来,“导论”、“文选”、“索引”三者,呈鼎立之势,互相呼应,缺一不可。相对来说,前后二者定位明确,不会有太大的争议;反而是中间部分难以处理。在同一专题成千上万的论著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寥寥数十则,实非易事;更何况,这些选文除本身的学术价值外,还必须能大略显示学问推进的轨迹。百年文章,本就迭有变迁,再加上选录范围涵盖大陆、台湾和港澳地区的原创之作,如此体式纷纭,若强求一律,必定伤筋动骨。故对所收各文,除进行必要的版式统一(如简体横排、篇末注等)之外,其他

则尽量尊重原文保持原貌,这样既反映了学术史的真实,也能给读者以一定的历史感。

本丛书之兼及“史家眼光”与“选本文化”,要求编纂者将巨大的信息量、准确的历史描述,以及特立独行的学术判断,三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样的工作,虽不属如今大受推崇的“个人专著”,但借此勾勒出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若干面影,并给后来者的入门提供绝大方便,在我看来,“功莫大焉”。

2001年11月17日于京北西三旗

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 陈平原 主编

- |           |              |
|-----------|--------------|
| 先秦儒家研究    | 庞朴 马勇 刘貽群/编  |
| 魏晋玄学研究    | 汤一介 胡仲平/编    |
|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 | 刘泽华 葛荃/编     |
| 中国史学史研究   | 瞿林东/编        |
| 历史地理研究    | 葛剑雄 华林甫/编    |
|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 罗宗强/编        |
| ※古代女诗人研究  | 张宏生 张雁/编     |
| 词曲研究      | 王小盾 杨栋/编     |
| 元杂剧研究     | 吴国钦 李静 张筱梅/编 |
| 南戏与传奇研究   | 徐朔方 孙秋克/编    |
| ※晚明文学思潮研究 | 吴承学 李光摩/编    |
|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 夏晓虹/编        |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 陈平原/编        |
| 比较文学研究    | 乐黛云/编        |
| ※文心雕龙研究   | 张少康/编        |
| 红楼梦研究     | 刘梦溪/编        |
| 屈原研究      | 褚斌杰/编        |
| 陶渊明研究     | 袁行霈/编        |
| 李白研究      | 周勋初/编        |
| 鲁迅周作人研究   | 陈平原/编        |

(标有※者为已出)



总序/陈平原	1
20世纪晚明文学思潮研究概述/吴承学 李光摩	1
《陶庵梦忆》序/周作人	57
中国文学的变迁/周作人	60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书君	69
李卓吾与左派王学/嵇文甫	74
重印袁中郎全集序/郁达夫	84
袁中郎与政治/阿英	87
有不为斋丛书序/林语堂	94
袁中郎的诗文观/刘大杰	98
重印袁中郎全集序/周作人	107
袁中郎的佛学思想/张汝钊	113
“招贴即扯”/鲁迅	123
杂谈小品文/鲁迅	125
《晚明二十家小品》序/施蛰存	127
公安竟陵与小品文/陈子展	129
李卓吾与新文学/朱维之	138
公安三袁与左派王学/嵇文甫	155
竟陵诗论/郭绍虞	161

关于袁中郎和他所倡导的文学革新运动/任访秋 .....	172
浪漫洪流/李泽厚 .....	188
绝代的散文家张宗子/黄裳 .....	195
汤显祖和晚明文艺思潮/徐朔方 .....	203
为竟陵派一辩/吴调公 .....	220
试论凌濛初的“两拍”/章培恒 .....	244
《中国新文学渊源》自序/任访秋 .....	257
《中国新文学渊源》结束语/任访秋 .....	262
袁中道论略/钱伯城 .....	267
东西方启蒙文学的先驱/孙逊 .....	280
晚明小品论略/陈平原 .....	303
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的时差与异质/张富贵 刘中树 .....	314
论晚明清言/吴承学 .....	332
晚明心态与晚明习气/吴承学 李光摩 .....	351
市民文学中的士人趣味/高小康 .....	370
从愤世到自适/左东岭 .....	388
晚明浪漫文学思潮美学理想的三个层次/廖可斌 .....	401
袁宏道的山水癖及其游记/周质平 .....	419
由菜根谭看晚明小品的基本性质/龚鹏程 .....	430
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陈万益 .....	464
胡应麟诗论中“变”与“不变”的探索/陈国球 .....	500
20 世纪晚明文学思潮研究论著目录索引 .....	526

## 20 世纪晚明文学思潮研究概述

吴承学 李光摩

在 20 世纪中国人看来,晚明文学与隆汉盛唐文学相比,大概不算伟大的文学时代,不过,如果就传统文学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之关系这一点上看,晚明文学却是其中与之最为密切、最为直接的时代。晚明文学思潮就是在 20 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视野的观照和阐释中大放异彩的。

### —

五四与晚明,本是两个相隔遥远的历史时期。按照中国史学界的传统划分,一个属于现代,一个属于古代,中间又隔了一个近代。然而,五四与晚明的关系却是 20 世纪一个热门的学术论题。

五四以来,传统文学受到空前冲击,陈独秀、胡适等人对中国正统的文学史谱系:唐宋八家——明前后七子——归有光——桐城派,作了猛烈的攻击<sup>①</sup>。而周作人则在积极批判正统派文学的同时,注重发掘非正统文学如公安、竟陵等的积极因素,试图重建中国新文学的谱系<sup>②</sup>。1932 年,周作人在辅仁大学作过几次讲演,讲演整理稿便是《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他以晚明文学为言志文学,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这样,周氏就在文

学界祭起一面“言志”的大旗，提出“反集团、反君师、反载道”的口号。其实，周氏这番见解解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早在1926年他就说：“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我们读明清这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绪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sup>③</sup>同年，在致俞平伯的信中，他再次申明：“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他为沈启无所编《近代散文抄》写的序中，集团与个人、载道与言志的提法已经出现，并认为这两种势力永远相搏，酿成了过去的许多五花八门的文学运动<sup>④</sup>。两年后，周氏又为此书作新序，大力推崇三袁的文章，又把他们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紧密相联<sup>⑤</sup>。

任维焜（访秋）直接受到周氏的影响。在《袁中郎评传》中他同意周氏在《燕知草跋》和《杂拌儿序》中对小品文的意见，认为在现代作家、现代小品的观照下，公安派小品的价值自然可以显现出来。不过他认为：“近代文学革命——十余年前我国文坛之革命，其主张差不多与公安派的都一样，这也许不是受着公安派的影响，而是偶然的暗合吧。”<sup>⑥</sup>任氏这篇文字完成于1931年，周氏尚未有《源流》的讲演。1935年，任氏到北大研究院读书，定的论文题目便是《袁中郎研究》，而导师即为周作人。尽管如此，他在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的关系上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意见：“这次的新文学运动，我们无须附会说是从公安来的，因为它显然是受着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以及西方的文艺论与创作的影响，而与晚明文学是绝无关系的。”<sup>⑦</sup>这篇论文完成于1936年，经过修订和补充，直到1983年才出版。

胡适大概是最早论述五四新文学渊源的人。他为《申报》50周年所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记述了晚清至五四新旧文学过渡时期的历史。他又是倡导“历史的进化的文学观”的，认为在中国最早倡导文学随时代变迁的是公安袁氏三兄弟。但他对三袁的

作品并不怎样看重,认为和三言、二拍相比,“也都成了扭扭捏捏的小家数了。”<sup>⑧</sup>

早在1929年陈子展即在《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中极为关注外来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刺激。因此,他对周作人的大谈公安、竟陵也是很反对的。他先后在《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道统之梦》,《文统之梦》和《京派的起源》等文章,认为周作人推重袁中郎,意在争文学上的正统。陈氏的这一推测,确实是有道理的。针对30年代左翼文学(所谓载道派或奉命文学)的崛起,周作人也不甘心退守一隅,他作新文学的溯源工作,其意正是为新文学(他称为言志派)奠定正统地位,顺利进入历史做准备。陈子展的论点恰好代表了左翼意见。他认为如果说有言志派与载道派的话,则公安、竟陵派是注重性灵的言志派,而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者则是注重社会文化的载道派,因此,论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倘非别有会心,就不必故意杜撰故实,歪曲历史,说是现代的新文学运动是继承公安竟陵的文学运动而来。”<sup>⑨</sup>

然而支持周氏观点的也大有人在,林语堂就是一个有力的同盟。他对沈启无《近代散文抄》评论说:“这派(公安、竟陵)成就虽有限,却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足以启近代文的源流,而称为近代散文的正宗,沈君以是书名为《近代散文抄》,确系高见……大凡此派主性灵,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学普遍立场,性灵派之排斥学古,正也如西方浪漫文学之反对新古典主义,性灵派以个人性灵为立场,也如一切近代之个人主义。其中之排斥仿古文辞,与胡适之文学革命所言,正如出一辙。”<sup>⑩</sup>他标榜晚明文章之近代性,认为与西方近代文学和五四文学相一致。在《小品文之遗绪》中,林语堂称小品“须寻出中国祖宗来,此文体才会生根。”<sup>⑪</sup>周作人的影响显然可见。

稽文甫是一位较早接受历史唯物论的学者,他的《左派王学》就是运用历史唯物论研究思想史的一个范例,在序中他也表明了周作人的影响:

从前讲明代文学史的,只注意一堆假古董。……近来经周启明、俞平伯等提倡晚明文学,特别表章公安、竟陵诸子,于是我才恍然见到明中叶以后的文学界自有一种新潮流,其自由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的精神,直使现代新文学运动家倾慕赞叹,拉为同调,这要算研究明代文学史的一个新方向。……道学界的王学左派和文学界的公安竟陵派,是同一时代精神的表现。<sup>⑫</sup>

嵇氏敏锐地看出周作人所提倡的公安、竟陵研究,是明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这已为此后数十年的历史所证明,他还指出这种文学新潮流同思想界的王学左派相一致,此为后来的大多数文学研究者所接受。在《左派王学》的序言及附录中,嵇氏对明中叶以后商业资本的扩大而深入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与后来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的精神基本一致。

由于受周作人等人的影响,朱维之充分肯定了周氏在《源流》提倡晚明文学的影响。又认为李卓吾的文学主张,“却和二十世纪的我们新文学运动相一致”<sup>⑬</sup>。朱氏还认为李卓吾不但在文学上而且在思想上具有现代的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李氏思想的因子,陈独秀、吴虞都是其继承人<sup>⑭</sup>。陈念萱也认为晚明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渊源<sup>⑮</sup>。刘大杰也认为公安派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精神是相同的:“晚明公安派的议论,精神是浪漫的,态度是革命的,一反传统的释古的思想,而建立起重个性、重自由、重内容、重情感的新理论。……这与五四时代的文学运动精神完全相同。”<sup>⑯</sup>

与周作人追宗晚明不同的是以嵇文甫等左倾的一派,他们从历史唯物论出发,特别重视李贽等王学左派和五四思想的相通性,强调经济、文化与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一路向与后来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相结合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谈论晚明文学,依然是这一路向:先谈社会环境,即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情境→在思想

界的反映,即李贽和王学左派的影响→在文学界的反映,公安三袁等。

由于50-70年代一连串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斗争,打断了学术研究的连续性,也切断了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国内学术界被人为扭曲,被赋予过多的政治色彩;又由于中国历史以政治标准划分,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成了近代、现代的分界线,打断了学科间的联系,于是王瑶、唐弢等人编写的现代文学史便只好从五四讲起,晚清尚未顾及,遑论晚明。

新时期以来,五四与晚明的联系重新成为热门话题,李泽厚是新时期重建晚明文学与五四新文学联系较早的一个学者,在《美的历程》中他称李贽具有近代解放因素的民主思想,具有市民——资本主义的性质,是晚明浪漫思潮的中心人物;并称公安派“之所以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仍有影响,原因就在它们毕竟开始有了近代文人气息。”<sup>⑩</sup>李氏的这些意见本身并无多少新意,只不过是30年代自由派文人意见的重现,或是50年代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的适当延伸,然而在当时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冯至则基本上对追宗晚明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五四以来受英国兰姆等人的影响,人们才动手写散文,随后便在二三十年代发现晚明小品的价值。在此之前,晚明小品无人过问,是外国文化推动了我们认识自己的传统<sup>⑪</sup>。同年,他重申先有了西方文学的影响,五四新文学才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sup>⑫</sup>。

张宜雷则认为五四新文学不但在“性质”方面有传统的源头,在“载道”方面也有它的源头,认为“从李贽和公安派经龚自珍、黄遵宪、梁启超和胡适、周作人,与从顾炎武、王夫之经戴震、章太炎和鲁迅、钱玄同,这两股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进步思潮在五四这一历史时刻汇合,它们共同构成了五四的民族文化思想渊源”<sup>⑬</sup>。

王瑶对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有持平之论,他认为“现代文学中的外来影响是自觉追求的,而民族传统则是自然形成的,它的

发展方向就是使外来的因素取得民族化的特点,并使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并认为鲁迅杂文在表现方式和艺术风格上同“魏晋文章”具有一脉相承之处;而周作人散文所追求的“雅致的俗语语文”,则在内容和形式上同传统散文(特别是明末小品)有着深刻的联系<sup>⑧</sup>。

1986年,任访秋出版了《中国新文学渊源》一书,这是周作人《源流》之后为新文学溯源的一项重要收获。在自序中,任氏自称此书受到周作人的启发。他认为晚明产生的“左派王学”,具有反封建意义和进步思想。到了西学东渐,欧风美雨与中国固有的市民阶级的革命思想相结合,于是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涛巨浪<sup>⑨</sup>。在文学上,“五四文学革命与晚明文学革新也有一定的联系,”认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不主义”,“从其精神实质上看,与公安派所提出的主张,实毫无二致。”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所提出的文学见解和主张,其来源有二:“一为中国所固有的,即继承了晚明文化革新这一潮流;二为晚清从西方输入的科学民主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新的文学论。”因此本书的结论是“五四的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从反孔教到反复古主义文学,就中国固有的传统来说,实上承晚明的文化革新运动。”<sup>⑩</sup>对比任氏30年代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后经多次修改而于1983年出版的《袁中郎研究》,其在五四与晚明文学关系上的观点,变化是颇大的。任氏弟子关爱和对五四文学的溯源也十分热心,其于晚明与新文学关系的看法与其师基本相近<sup>⑪</sup>。

在寻找晚明与五四新文学关系的论著中大多数论者都比较关注两者之间相同或相通之处,但也有人更关注其间的差异。贾植芳一方面承认周氏追宗晚明的意义,一方面又指出其不足,“只注重到两者的相似之处,而忽略了时间环境不同造成的根本差异”,由此导致了周氏消极的历史观——循环论<sup>⑫</sup>。张福贵、刘中树对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相通论提出质疑和反驳。他们认为,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虽然存在着一定的精神联系,但这并不能取消二者之间的本质差



异,它们不仅属于两个时代,更属于两种文化<sup>④</sup>。

1986年,海外华裔学者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在国内出版,该书把五四运动定性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海外的新儒家杜维明等也把五四运动跟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说成是偏颇的两极,这些论点在国内引起不同反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王元化从思想史的角度回应了林毓生等人,认为这是个涉及到如何理解传统文化整体性、丰富性的问题:“我认为五四没有全盘性的反传统问题,而主要的是反儒家的‘吃人礼教’。我不否认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但我不同意文化传统只能定儒家为一尊。”<sup>⑤</sup>严家炎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但没有‘全盘反传统’或割断中国文化传统,反而开启了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新阶段。”并以周作人《源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为例说明,“在先驱者心目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和传统文化‘中断’或‘断裂’。”<sup>⑥</sup>严氏认为持“五四全盘反传统论”者,忽视了即使在儒家文化中,原本就有非主流的“异端”存在。“特别到明末清初,已经形成具有启蒙色彩的文化,像李卓吾、冯梦龙、黄宗羲、顾炎武、颜习斋、戴震等思想家、文学家的著述,已经构成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⑦</sup>

这场论争的关键在于承不承认五四新文化已部分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如果承认五四以来的文学思想已成为我们传统的一部分,那“中断”或“断裂”论将无所依附;如果不承认五四以后的文化思想已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那问题自然就出现了。这场论争,客观上使现代文学研究者回到传统,从传统中发掘新文学的渊源。

80年代以来,古代、现代文学研究者从各自学科研究的立场出发提出打通古今界线。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章培恒、陈伯海等学者强调打通古代、近代、现代文学史,注重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等观点<sup>⑧</sup>。这种思路倒是先由现代文学研究界提出的,而且影响似乎更大。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